

励耘文库

穆木天

Mu Mutian Juan

陈 惇/编选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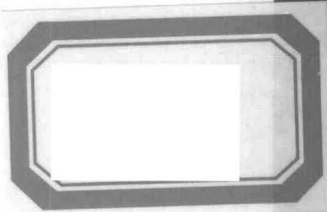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出版社

励耘文库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穆天

Mu Mutian Juan

穆天 / 编选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穆木天卷/陈惇编选.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励耘文库)

ISBN 978-7-303-14143-2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C53 ②I21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88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23.75

字数: 416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赵月华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张同龙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健

副主编：李国英 李春青 李怡(常务)

编委会成员(姓氏笔画为序)

刁宴斌 于天池 王 宁 王富仁 朱金顺

刘 勇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赵仁珪

赵月华 张 健 陈 惇 聂石樵 郭预衡

童庆炳 谢纪锋 董晓萍 谭得伶

总 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地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1908年5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月，从京师大学堂母体诞生了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楚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勋勋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学，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多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的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

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和抗日的烽火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的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全面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领悟我们的使命，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10日

目 录

导语/1

《法国文学史》(选)/35

卷头语/37

第五章 布尔乔亚社会的文学/39

第六章 现实主义文学/78

第七章 现代文学/116

世界文学基本讲义(选)/162

古代希腊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65

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莫利哀/175

德国民族诗人歌德/193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231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246

外国文学评论译文选/260

史诗《英雄国》及其作者/260

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274

洛甫·德·维伽及维伽派/283

西班牙的巴乐歌与卡尔代龙/301

现代印地语文学的基本流派和发展道路/309

附录一 穆木天著译年表(1916—1957)/337

附录二 穆木天外国文学评论译文目录(1957—1966)/363

后 记/370

导 语

在人们的印象中，穆木天先生首先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象征派风格的诗歌创作，他的那些关于新诗发展和诗歌运动的评论，都曾在文学史上起过引领作用，因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穆先生有大量的翻译作品问世，特别是他对巴尔扎克的译介，时间早，数量大，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有独特贡献。于是，人们又把他称为翻译家。但是，仅仅这样来了解穆先生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不仅是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而且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和教育家。近年以来，穆先生在诗歌和文学评论方面的成就，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穆先生在那些方面的作品，已有结集出版，研究论著也已问世，这是十分可喜的。^①但是，对于穆先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就，研究得并不够，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开发。现在，趁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先贤丛书》之际，我想，应该把有限的版面留给这些方面，以补救先前的不足。所以，在这本文集里，已经出版的诗歌和文学评论就不再收集在内。本集的前言也仅就穆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成就，提供一些材料和事实，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供研究者参考。

^① 198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穆木天诗文选》，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木天诗选》，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这三部书基本上汇集了穆木天先生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方面的成果。在穆木天研究方面，吉林师范学院下过大工夫，在学报上开辟穆木天研究专栏（发表了十几篇评论穆木天的文章），举办全国首届穆木天学术讨论会（1990年），会后又编辑出版了《穆木天研究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孙玉石先生、蔡清富先生和陈方竟先生对穆木天研究的贡献。新时期以来，孙玉石对穆木天的《谭诗》的高度评价，对人们重新认识穆木天有着开启作用。蔡清富较早全面研究穆木天，从收集资料、编写生平著译年表，到撰写传记，到研究评价穆先生的成就，筚路蓝缕，不辞辛劳。陈方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穆木天研究，先后发表多篇研究文章，特别是《穆木天传略》、《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和《穆木天著译年表（1916—1957）》，可以说是穆木天研究的最好的成果。

穆先生的学术研究，应该说，从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1918年，他官费留学，来到日本。本来，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原有的对理科的兴趣，志愿学习数学，但是由于高度近视，不能学习理工类学科，只能投身于文科。于是，他选择了法国文学。从此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穆先生从理科转向文学，除了上述的生理上的原因，更有其内在的思想上的原因。他1915年来到天津，以优异成绩进入了人称“北中国的人才摇篮”的南开学校。从偏僻的山村来到大城市，打开了他的眼界。在南开这座开明、进步的学校里，他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教育，树立起自己的人生志愿。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前，南开的学生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他们为晚清政府的腐败而愤慨，为祖国面临内忧外患而忧虑，努力探寻着救国的道路。许多人受校长张伯苓的影响，抱有“科学救国”的思想。穆先生自然也不例外。1919年，也就是穆先生来到日本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给了他另一种启发。他原本接受进化论观点，相信世界和人类要进步，更相信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人类自己。正如他在《格物家之心理》一文中所说：“天然之变，由于自然；人事之变，则在人为”，“人为则世界变”^①。因此，他很容易就接受“五四”时期那些先行者的思想，从对“人为”的重要性的认识再前进一步，进入到把改造国民性放在救国之道的首位，而文学在这方面将起到特殊的作用。有关这样转变，穆先生在后来有过明确的自述：

我的向文学的转变，是以“五四”运动为机运的，以往，我以为中国需要建立工厂。可是，从“五四”起，我又以为中国需要几个战斗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了。^②

他的最初的文学志趣在儿童文学方面，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王尔德、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就是他的最爱。他阅读和翻译王尔德童话，向往

^① 转引自陈方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3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② 穆木天：《我与文学》，见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42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着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而且模仿王尔德的散文写出他的最初的文学作品《复活日》。这种文学志趣与他当时的世界观、人生观有着明显的联系。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他相信世界将进入一个“万生归一，世界返真”的人间天国。这种天真的思想使他对未来抱着童趣般的乐观的情绪。

但是后来，他虽然并没有完全失去他的童真和乐观，他的文学兴趣却转向了法国象征主义。这个变化对穆先生来讲却是非同小可，因为这决定了他后来以什么样的面貌在中国文坛上亮相，决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其间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环境与生活的变化。1923年的夏天和同年冬天，穆先生先后两次回国；这一年的9月，也就是在他第一次回国后重返东京的时候，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1924年暑假，他来到伊东，在这里遭遇到一次失败的初恋。这几件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穆先生出生在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是在无忧无虑的情况下度过的，但是，1920年父亲去世后，家境日益拮据，每况愈下。家庭的衰落以及自己的无奈，在他的思想上平添了一层阴影。从家乡回到东京，见到的是灾后的惨状，顷刻之间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倒塌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惨不忍睹。两个方面的沧桑之变对于一向乐观天真的年轻的穆木天，无疑是一种打击，当然也会引起他的新的思考。失恋的痛苦使他感到凄凉和孤独，一时间情绪低沉，甚至想到过自杀。亲身的经历把他从美好的憧憬拉回到灾难、不幸和贫困的现实，那个童话般美好的未来变得遥远了。阴云挡住了理想的太阳，明亮的天空暗淡了，世界变得复杂而诡秘了。尽管理想还在招呼着年轻的诗人，但是它似乎变得模糊了。理想使他激情满怀，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无尽的思绪，使他变得深沉，变得充满遐想了。穆先生后来说自己那时“从阳气变成忧郁的，由冲击的变成回顾的”，内心有一股“颓废的情绪”。^①这样的心理基础，当然很容易与象征派诗歌发生共鸣，从中找到宣泄的途径，如他自己所说：

我寻找着我的表现的形式。……在细雨中，在薄雾中，在夕暮的钟声里，在暗夜的灯光中，寂寞地，孤独地，吐出来我的悲哀。^②

穆先生向往法国文学的第二原因，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术氛围。1923年初，穆先生来到东京帝国大学上学。那时，正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国文学

^① 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见陈梓、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41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② 同上书，418—419页。

专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据王忠忱教授查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国文学学科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初，从1923年起，由辰野隆、铃木信太郎、山田珠树三位教授担任主导，他们都对19世纪末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具有浓厚兴趣和深入的理解，尤其是辰野和铃木，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发表著述，都以象征主义诗歌为主要内容。^①穆先生从京都来到这里之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象征主义的氛围中。关于这一情况，穆先生自己后来也有过这样的回忆：

到了大学，完全入象征主义的世界了。在象征主义的空气中住着，越发与现实相隔绝了，我却是相当地读了些法国象征诗人的作品。贵族的浪漫诗人，世纪末的象征诗人，是我的先生。^②

第三个原因，是厨川白村的影响。穆先生在京都三高学习的时候，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正在那里任教，而且受到学生的欢迎，在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厨川的名言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学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他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基础，把“生命力”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原动力，认为文学创作是生命的自我表现，同时他又把文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思考，从“自我”这一中心出发，把它引向“人间”和“社会”，提出“文艺为人生”等口号。穆先生应该是能够直接听到厨川讲课的，厨川的这种重视作家的生命体验、文艺与人生关系密切等观点也就为他后来形成自己的文学思想埋下了根基。^③

就在这样一些因素的作用之下，穆先生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穆木天确实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象征主义的世界里了，他的创作和评论都体现出象征主义的影响。他不但效法法国象征主义创作诗歌；而且为了更多地了解象征主义，用心学习了象征主义的诗歌理论。他后来所写的诗歌论文《谭诗》说明他对象征主义有很深的了解。当他看到中国新诗面临的问题时，立即向中国诗歌界介绍象征主义，把它看作解决新诗发展方向的良药。当他的学业快要结束、考虑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也把象征派诗人萨曼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总之，学习、思考、写作，什么都离不开象征主义。

^① 王中忱：《日本中介与穆木天的早期文学观杂考》，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励耘学刊》2006年第一辑（总第三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3月。

^② 穆木天：《我与文学》，见陈淳、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4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③ 这里采用了陈方竟在《穆木天传略》中的说法。尽管现在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以证实穆先生在东京三高学习期间是否听过厨川的讲课，但这种推测不是没有道理的。

穆先生的早期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诗歌评论、文学评论、文学翻译等几个方面，且这几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是最主要的，不过，他那时正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学术研究必然要占据了他相当多的精力。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学习、研究、创作、评论是互相联系的。学习研究对他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对他的创作和评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从学习研究中吸取营养，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学思想，这些思想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又引导他在学术上有着自己的取向。

以学习研究来说，法国文学当然是其中心。从他当时的文学志趣和学习任务来讲，又必然会把自己注意力的重点放到象征主义方面。这一点，从他选择象征主义诗人阿尔贝·萨曼(1858—1900)作为其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一事，就可以看出。象征主义的影响同样表现在他当时所写的诗歌和《谭诗》(1926)这一篇极其重要的论文中。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就在他完成和发表《阿尔贝·萨曼的诗歌》(1926)这篇论文的同时或之后不久，就发表了《法国文学的特质》(1927)、《维尼及其诗歌》(1926—1928)、《维勒得拉克》(1928)等论文。《法国文学的特质》是通论法国文学史的，《维尼及其诗歌》是研究浪漫主义诗人的，《维勒得拉克》又是研究戏剧家的。这一事实说明，穆先生当时的学习和研究并不局限在象征主义，他的视野包括法国文学的全部，既有历史，又有当代。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孤立地研究象征主义，而是在法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来认识和研究象征主义。这就形成了他对象征主义的一些独特的观点。

《阿尔贝·萨曼的诗歌》虽是一篇毕业论文，其实也可以说是穆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跨入学术殿堂的一份相当精彩的献礼。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作者评论萨曼作品的一些具体看法，而是进一步发掘其中内在的文学观念，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些更值得注意的东西。

象征主义是以它对浪漫主义、帕尔纳斯派和自然主义这些当时盛行于法国的文学传统的不满为其艺术追求的出发点的。尽管它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法国诗歌的传统，但是反叛精神应该是它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但是穆先生的论文却偏偏着重研究萨曼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帕尔纳斯派对诗人的影响，研究他与传统的联系。这里表现了当时穆先生对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在他看来，文学革新对文学传统有其反叛的一面，但是，历史的长河不能割断，任何革新都不可能脱离传统，革新者若能处理好继承传统和融合个性的关系，就能为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点，他在文章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加以表明：

我们都是历史的产儿，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开传统，一位诗人的特色在于其作品的复杂性，即他把各种不同的潮流结合起来，并把它们与自己的个性融为一体。无论他是传统主义者还是革新者，他都只是人类运动的长河，即反映人类永恒形象的长河的延续。在与过去相结合的同时，他提炼着自己的特性，使自己持续的梦幻理想化，从而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界：由此便形成了魔环。^①

穆先生的这个论断是符合象征主义的实际的。被认为是象征主义先驱的波德莱尔本身就兼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多种特色，作为象征主义繁荣时期的代表魏尔伦、蓝波、马拉美都曾是帕尔纳斯派的成员，他们刻意求新，致力于诗歌改革，开创了西方诗歌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时期，但是在艺术上却仍然对传统有所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萨曼进入文学界的时候，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的法国象征主义已经走过它的繁荣期而开始衰落。萨曼和古尔蒙、雷尼埃等人作为世纪之交的象征主义的代表，继续走着象征主义的道路。他们的作品还继续绽放着象征主义的花朵。萨曼创办的《法兰西信使报》成为象征主义的权威刊物，他的诗歌集《在公主的花园里》(1893)获法兰西学院的诗歌大奖，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范例^②。不可忽视的是，他们的作品同样接受了浪漫主义、帕尔纳斯派的影响。对于他们的象征主义前辈则又改变其风格，而使其摆脱了深奥晦涩的窠臼，获得了新的生命。萨曼等人在继承的基础上推进了象征主义，而且，使象征主义更加普及，走出法国，走向世界，进而引起了遍及全欧的后期象征主义运动。穆先生正是从这个文学发展实际的研究中得出上文提到的那个可贵的认识：革新不能脱离传统。

由于穆先生当时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所以他的研究也持象征主义观点。他认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奥秘。”^③即使在谈论文学的写实性的时候，他也从这样的观点来辨析

① 穆木天：《阿尔贝·萨曼的诗歌》，见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② 此处借用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论述，见该书第1卷，28—2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③ 穆木天：《谭诗》，见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14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写实”与“写真”的区别：“写实是心理的，而写真则完全是物理的结果。写实是艺术的，而写真是科学的。写实是主观的，而写真是客观的。写实是具体的，而写真是概念的。写实是人的，而写真是物的。”因此，在他看来，写实文学是“内意识的结晶”，是“内生活”的“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①。这是一种象征主义的“写实观”。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所谓“内生活”、“内意识”并不是纯主观的无由的思想感情，并不是索然独居于象牙之塔中冥思苦想而得来的东西，实际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人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所产生和所获得的主观意识，或者说是诗人在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一种内心体验、一种心理状态。这一点，在他的长篇论文《维尼及其诗歌》中体现得十分清楚。

穆先生对维尼感兴趣，并不偶然。在《谭诗》一文中，他说自己曾经饶有兴味地读维尼的诗集。后来，他在研究萨曼的时候，也发现萨曼所受的维尼的影响，更了解了维尼在法国文学史上的意义。维尼曾经被认为是一个“象牙塔”里的诗人^②，他的作品是不是纯主观的自我表现呢？穆先生的论文抓住维尼作品的一个核心——“精神孤独感”展开自己的论述，具体地分析维尼作品中的孤独感及其发展过程：“维尼的诗的生活，由《Stello》结分为二期：前期是一种漠然的不安，后期完全是理智的悲哀。用笼统的话来说：前期是心的孤独中混着智的孤独，后者则心的孤独被溶在智的孤独的里边。前期宁是传拜伦的面影，是经过思索的天才的孤独的心情；后者则是如 Pascal 的哲人的智的苦闷，普遍的人间的烦恼。”这样的孤独感从何而来？文章从分析维尼的身世开始，说明家庭和教育形成他“一面憧憬外的生活，一面他则具沉思的特质”。他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知道的社会使命。他理想做拿破仑，做将军，做拜伦那样的诗人。总之，他向往伟大的一生。然而，学校生活，军队生活，爱情与婚姻，都让他碰壁。“一切的幻灭，一切的失败，越发使他作了内面的人了。沉思，默想，直引他入了象牙之塔。”“外生活的光荣，内生活的神秘，在维尼的一生中，作了很大的矛盾。在这矛盾的弦上，维尼作了他的不调和的灵肉的苦斗，开了他的苦闷之花。”

① 穆木天：《写实文学论》，同上书，342、345页。

② 维尼有一首诗《角笛》，写到法兰西古代英雄罗兰临危不惧，临死时吹起“象牙的角笛”的故事，喻指诗歌之高贵，如同罗兰手中的象牙角笛。维尼在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狂风暴雨之后，晚年远离政治，离开巴黎隐居。当时的批评家圣伯夫说他进了“象牙之塔”。

他的冷静的外壳里头，确是盛着热滚滚的大海。他的贵族的外貌里边，确藏着救世济民的怜悯的情肠（18世纪的传统）。他的要在文坛上成功的心非常的强，而他确又有深刻的文学的意识。他一方面非常的强，而一方面却非常的软弱。这种种的关系，使维尼的作品上，被盖了一重覆幕，使维尼成了一个象征诗人。^①

由此可知，穆先生那时倾心象征主义，在《谭诗》等文章里提倡“纯粹诗歌”，在《写实文学论》中提倡文学的自我表现，并不是希望人们走进象牙塔，去歌唱自我。他提倡的是：诗歌要有自己的世界，诗应该是诗，诗歌要有自己的形式，诗歌写的是诗人来自生活的内心的真情实感。《维尼及其诗歌》可以说是那几篇文章的一个补充，同样是针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弊病而发。维尼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外生活的激荡，内生活的苦斗，以及他对文学的追求，造就他成为一个诗人，三者缺一不可。

我们如果把穆先生的这些文艺思想放到“五四”退潮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对“文学革命”的反思和探索新文学发展道路的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些意见确实是针对着“五四”文学的弊病，有感而发的。走象征主义的路，不见得对，但是其中一些深层的观点，如正确对待革新与传统的问题，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诗应该成为真正的诗等，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

二

20世纪30年代初，穆先生的文艺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信奉象征主义，转变为提倡现实主义，与此同时，他用一种几乎是忏悔式的语言，回顾自己早期的生活、思想和创作，清算自己过去的“错误”。在理论上，他抛弃过去力主“纯粹的诗歌”的倾向而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来重新认识和解读文学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还是需要从穆先生的个人经历以及时局和环境的变化说起。

1931年1月，穆先生来到上海。那年的初秋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穆先生的家乡——东北三省。紧接着，就是1932年的

^① 穆木天：《维尼及其诗歌》，见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3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上海“一·二八”事件，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国家面临民族危机并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穆先生本是一个热血青年，面临家乡的灾难，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他义愤填膺，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再说，那时正是国际文坛上的“红色的三十年代”，上海又是左翼文学运动的中心。这也是穆先生之所以离开家乡而来到上海的重要原因。当年，他加入了“左联”，主持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活动，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曾经为援助东北义勇军而联络宋庆龄、沈钧儒、何香凝等社会知名人士，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担任秘书长。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穆先生认为，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沉浸在象征主义的世界里了，因为那“不合时宜”。作为诗人，他认为诗歌应该揭露和控诉侵略者的暴行，应该用来振奋民族精神，而不再是咏叹自我。正如他自己所说：

目睹着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历着“九·一八”的亡国的痛恨，我感到了诗人的社会的任务。除了真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之外，还有别的更大的诗人的使命么？法国的拉马丁说：“Honte a qui peut chanter que Rome brule...”^①在此国难期间，可耻的是晚风弄月的诗人！诗人是应该用他的声音，号召民众，走向民族解放之路。诗人要用歌谣，用叙事诗，去唤起民众之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的。^②

1932年，他团结了一批年轻的诗人，成立“中国诗歌会”，创办《新诗歌》。他在为这份杂志执笔的发刊词《我们要唱新的诗歌》中，表明了他的新的文学观念：

我们要唱新的诗歌，歌颂这新的世纪。/……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因为那已成为过去。/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情绪，/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

① 法文，意为“哀罗马兮，生灵涂炭！犹吟风月兮，不知羞耻！”

② 穆木天：《我与文学》，见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4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个。……^①

从写“内生活”到“要捉住现实”，从“自我表现”到“歌唱新世纪的意识”，简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他检讨自己的文学思想的时候，认识到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受个人感伤的支配而一头扎进了象征主义的幻想世界。现在，应该听从时代的召唤，走出个人的幻想的世界而投身于现实，投身与民族解放斗争之中。其实，这种转变有着穆先生身上原有的基因。这一点在他早先所写的《谭诗》里，在他论述“纯粹的诗歌”与“国民文学”的关系时，就可以看出。

穆先生早年信奉象征主义，追求唯美，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少年时代，他跟着塾师读书，接受的是传统的经世治国的思想；五四前夕，他在南开中学上学，接受的是近代爱国主义教育。所以，在他的血脉里，早已灌输着关心现实、关心国家前途的精神。当他经历了农村凋敝，懂得日本侵略故土的祸害之后，这种亡国之痛和振兴故国的愿望与日俱增。因此在他看来，个人与国家民族是不可分的，对一个人来说，他的灵魂深处最宝贵的也是应该有的东西，那就是“国民意识”。正因为如此，国家民族的一切与个人之间可以发生共鸣，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可以达到契合，用穆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发生“交响”，这时，诗歌自然产生。浅薄的人没有国民意识，这样的人无法与客观世界产生共鸣，也无法感受到美，无法写诗：“故园的荒丘的振律，振振的在我们的神经上，启示我们新的世界；但灵魂不与它交响的人们感不出它的美来。国民文学是交响的一形式。人们不达到内生命的最深的领域没有国民意识。对于浅薄的人国民文学的字样不适用”^②。由此，穆木天得出结论：

国民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不作交响，两者都不能存在，而作交响时，二者都存在。……如此想，国民文学的诗，是最诗的诗也未可知。^③

在这里，穆先生不但巧妙地运用象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而且把问题引申了一步。他特别强调了诗人主观世界的深浅和

^① 穆木天：《我们要唱新的诗歌》，《穆木天诗选》，89—9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②③} 穆木天：《谭诗》，见陈悖、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14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